

【乡村振兴的理论与实践】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谁在谈？谈什么？

豆书龙 朱晴和 丁大增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人文社会发展学院,杨凌 712100)

摘要: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研究现存政策、理论与实践三种取向。主流政策派聚焦于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顶层设计,围绕其历史必然性、提出必要性、实施机制、规避误区展开论述。学术理论派重点关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理论内涵与立论基础,围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内涵意蕴,形成整体与内部二维视角解构,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论、百年乡建承继论、城乡融合发展论、外部风险应对论与“和”文化继承论等立论基础,并瞄准农民村庄复合向度探讨其内生动能。基层实践派主要关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实施保障,认为应以县乡村三级干部、企业和社会组织为实践主体,根据其各自定位承担不同职责,实现优势互补。然而,作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主体的农民却被排除在话语体系外,导致政策、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联系断裂。此种断裂与理论阐发、现实关涉、国际对话缺位等共同构成了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理论深化与实践效能提升的制约因素。因此,未来研究应聚焦农民、理论、现实、对外和整体视角,提升研究实效性、学理性、针对性、包容性及系统性,推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实践—理论—政策”大循环。

关键词: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主流政策派;学术理论派;基层实践派

中图分类号:F01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7465(2024)02-0038-13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确处理工农城乡关系的重大战略部署。从2005年“社会主义新农村”到2013年“美丽乡村”再到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的陆续提出,党和国家素有重视乡村建设传统。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首次提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①,为中国式乡村建设提出了发展新目标与高要求。进而,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农业农村部一号文件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人居环境和乡村治理方面作出系统部署;202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集中力量抓好办成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②。与此同时,浙

收稿日期:2023-10-15

基金项目:2022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青年项目“新时代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嵌合性发展模式研究”(22XJC710001);2024年度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专项青年项目“新时代农民参与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创新路径研究”(2024QN025);2023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人文社科项目资助课题“新时代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研究”(2452023315)

作者简介:豆书龙,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朱晴和,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硕士生;丁大增,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硕士生。

① 参见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

② 参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85115251734380366&wfr=spider&for=pc>。

江“千万工程”、湖北“共同缔造”、广东“百千万工程”等行动并联推进,由此和美乡村^①的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广受瞩目,如何深刻理解与高质量推进和美乡村成为亟待破解的学术议题。

和美乡村广受社会关注,原因有三个方面:第一,和美乡村表征为中国式乡村建设理论的最新成果,其意指塑形铸魂并重及统筹推进人、物、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较于既往乡村建设战略,和美乡村内涵拓展,指向明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内核更为彰显^[1-2]。第二,和美乡村顺应亿万农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新时代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更多体现在农村地区。和美乡村建设可使农民在特定地域获得全面生活保障,由关注生存转为享受发展,能够实现农民美好生活愿望。第三,和美乡村促进乡村综合价值实现。和美乡村本质是激活乡村内生动力、转化乡村综合价值的过程,即在宜居维度提升生活与生态价值,在宜业维度挖掘生产价值,在和美维度涵养文化与教化价值,从而整合利用乡村资源,激发乡村的生机和活力^[3]。因此,和美乡村通过理论创新、矛盾解决、价值实现,不断聚合时代意蕴,在社会各界刮起探讨和美乡村的“旋风”,并赋予不同主体各异的话语论述和研究想象。为了廓清与归并和美乡村的研究理路,本文从政策、理论和实践三个方面展开,从现有学术观点及成果中归纳和美乡村的主体类型与研究脉络,系统展演和美乡村谁在谈、谈什么,为高质量推进和美乡村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

一、主流政策派:如何保证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顶层设计?

主流政策派是和美乡村研究的先行者,由党政机关研究学者构成,他们从和美乡村内涵阐述入手,针对其历史必然性、提出必要性、实施机制及规避误区展开论述,聚焦于如何保证和美乡村的顶层设计。

(一)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提出的历史必然性

和美乡村提出的历史必然性表征为顺应城乡融合趋势的必然举措、推动乡村建设升级的必然选择与应对外部风险的必然要求,具体言之:一是顺应城乡融合论。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三农”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基础地位,加之城乡发展失衡的现实困境,催生城乡融合发展之需。和美乡村坚持将城乡视为整体,统筹规划、系统推进,是顺应时代趋势、契合基本国情的必然举措。二是推动乡建升级论。伴随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和美乡村的提出表明中国乡村建设实现了由生存型到发展型的跃升,是新征程乡村建设升级的必然选择^[4]。三是应对外部风险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同步推进,须以国内发展确定性应对国际不确定性。和美乡村建设能够激活农村潜在内需,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助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以国内大循环融入经济全球化格局,从而防抗经济博弈、政治干预等国际风险,保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行稳致远^[5]。

(二)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提出的必要性

和美乡村发轫于中国式现代化语境,具有缓解主要矛盾、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现实必要性,同时通过思想指引规避实践误区,彰显理论必要性^[6],表现为如下三维向度:一是缓解社会主要矛盾。农业农村发展滞后于工业化、城镇化,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仍是社会主要矛盾的集中体现。和美乡村能够助推农村生活条件完备、农民就地就近就业、乡风

① 为使文章内容简练,除摘要与标题外,正文中“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由“和美乡村”替代,特此说明。

文明和谐、城乡协调发展,成为破解现阶段乡村振兴掣肘的必由之路^[5]。二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美乡村锚定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将各部门、各条线强农惠农政策汇集于乡村,在新历史阶段实现乡村生活形态现代化^[7];同时将“和”的中华文明内核融于乡建,赓续天人合一的生态观、求同存异的民族观、耕读传家的价值观、以和为贵的道德观^[1],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三农”诠释与践行“第二个结合”的体现。三是引领思想的必要性。急于求成的功利观致使部分地区的乡村建设出现行为偏差,陷于低水平同质化泥淖,导致本土特色与传统文化的双重缺失,其实质是农耕历史脉络的断裂及农民诉求的遮蔽。和美乡村以“和”文化作为乡建“精气”、彰显乡村“土气”、焕发农民“生气”、融入时代“朝气”,在尊重社情民意前提下,从经济社会基础出发,挖掘并激活乡村自然人文资源^[1]。

(三)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内容阐释

主流政策派基于党的二十大报告,综合乡村建设各领域的政策文件、讲演论断,对和美乡村各子系统作出具体阐释。和美乡村以“和”文化赋能乡村建设,表征为“和”文化的“五融入”,表述如下:一是“和”文化融入产业,提升产业兴旺成色。通过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促进三产融合,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将社会化服务嵌入农业生产,以大数据赋能要素优化配置^[5-6];探索村企合作、集体经济发展等联农带农方式,优化利益联结机制,发展富民产业。二是“和”文化融入生态,彰显生态宜居亮色。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8];立足乡土、地域和民族特色改善村庄风貌,以现代元素赋能村居风貌的挖掘^[6]。三是“和”文化融入乡风,挖掘文明乡风特色。发扬优秀乡村文化,以保护为前提,挖掘文化遗产的农耕、民族、地域特色,实现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创新道德评议等机制推动移风易俗,涵养和顺乡风,挖掘弘扬传统文化内涵的价值遵循^[9]。四是“和”文化融入治理,坚守治理有效本色。健全党建引领的“三治融合”体系,创新党政统领、农民主体、社会参与的治理机制,培养农民主体意识,构建乡村法治秩序,强化德治文化认同^[8]。五是“和”文化融入生活,夯实生活富裕底色。提高基础设施完备度,聚焦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提升公共服务便利度,优化“急难盼愁”公共服务供给^[1,7]。

(四)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实施机制

和美乡村作为系统性工程,其实施机制体现在实施前提、实施原则、实施重点、实施框架、试点机制、运行机制和评价机制七大层面,归纳如下:其一,实施前提是坚持党的领导,构建横向党委统领、纵向分层落实的工作格局。其二,实施原则是坚持农民为主体,科学规划目标任务与时序进度,发挥农民主体作用,激活农民责任意识。其三,实施重点是硬件、软件两手抓,一手在人居环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领域创设农村现代生活条件,一手在提升乡村治理成效、推进精神文明、塑造乡村风尚方面持续用力。其四,实施框架是坚持组织领导保障、规划协同保障、评估督导保障、政策帮扶保障和舆论宣传保障“五个保障”^[5]。其五,试点机制是“五好两宜”国家级试点,即通过开展“五好两宜”和美乡村试点试验,以“规划好、建设好、环境好、经营好、乡风好、宜居宜业”为标准,打造和美先行示范区,形成“以点带面、以面带全”推进模式。其六,运行机制尚处探索阶段,以“千万工程”和“共同缔造”为省域代表,前者以绿色理念打通“两山”转化通道、以城乡统筹弥合发展差距、以党建引领统一思想行动、以内外兼修传承农耕文化、以农民中心厘清与政府行为边界等^①,后者则以党组织精准定位农民需

① 参见中央财办等部门印发《关于有力有序有效推广浙江“千万工程”经验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https://www.moa.gov.cn/xw/bmdt/202307/t20230707_6431656.htm。

求、以项目广泛调动农民参与、以体制机制创新拓宽农民权限、以下沉基层获知民意反馈^①。其七,评价标准尚未统一,以浙江省和重庆市和美乡村指标探赜为代表,前者将和美乡村解构为生态宜居建设、产业经济发展、基层社会治理、精神文明建设、经营运作机制、生产要素保障六重维度^②,后者则将和美乡村划分为环境、设施、庭院与和谐四大指数和十二项具体内容^③。

(五)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规避误区

和美乡村建设需在指导思想、行动观念和实践行动中规避模式僵化、急功近利、横向失调和纵向失衡四大误区,具体表述如下:一是指导思想须规避模式僵化误区。和美乡村既没有通用模式可沿用,也不可能东中西部时序统一、进度一致,而应因地制宜,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地理区位条件、人文社会情况划分村庄类型,差异化分类推进。二是行动观念须规避急功近利误区。和美乡村涉及“五位一体”领域统筹、乡村城市的区位统筹、党政民村企社的主体统筹,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应循序渐进、久久为功,保持工作接续性和政策持续性。三是实践行动须规避横向失调与纵向失衡误区。横向维度应规避重物质轻精神、重硬件轻软件的建设倾向,坚持内外兼修、形魂并重,既要保护农村人居环境、抓好民生建设,也要提升乡村文化价值、精神风貌;纵向维度要警惕破坏乡村原生环境的“大拆大建”行为,正确处理保护历史文化与村庄建设关系,挖掘乡村历史文化内涵,推进其与现代文化嫁接,实现有机更新与传承^④。

综上所述,主流政策派以保证和美乡村顶层设计为引领,解读文本内涵、厘清实施机制。然而,由于提出时间较为短暂、机构职能偏差和专业知识拘囿等原因,主流政策派对和美乡村制度体系的设计还未完善,仍处于分散探索阶段,且对和美乡村的理论逻辑梳理、发展模式建构、内生动力阐发等方面关注不足,但其明晰研究重点、引领学术思潮的重要作用无可非议。

二、学术理论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理论内涵和立论基础是什么?

学术理论派是和美乡村研究的主力军,由高校和科研机构专家学者构成,主要对和美乡村的内涵意蕴、历史定位、立论基础和内生动力展开论述。

(一)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内涵意蕴

学术理论派围绕和美乡村的内涵意蕴,形成整体与内部二维视角的解读。具体言之:一是整体解构论,即从维度、广度和深度角度具象化阐释其内涵意蕴,以“八和说”“七美说”“五和五美说”为代表。其一,“八和说”表征为城乡关系、产业发展、经济生态、村庄治理、公共服务、乡村类型、多元主体和共富发展之“和”^[4]。其二,“七美说”即产业兴旺的富足美、家庭和睦的亲情美、邻里和谐的互助美、人际和善的礼让美、治理和顺的升平美、民风祥和的淳朴美、人与自然和合相生的生态美。其三,“五和五美说”具象为“全域美、村庄美、田园美、人文美、生活美”的全景式美丽集锦及“产业和、生态和、文化和、社会和、治理和”的乡村生活共同体^[2]。学界虽对和美乡村内涵莫衷一是,但对其本质解读达成思想共振,即涉及农村生产、生活、生态三方面,兼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涵盖人、物、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① 参见湖北省部署“共同缔造”活动试点工作, http://www.hubei.gov.cn/zwjk/hbyw/hbywqb/202209/t20220906_4295026.shtml?eqid=ff0da42c000564ad0000000564267304。

② 参见浙江乡村建设促进会关于批准发布《和美乡村建设指南》团体标准的公告, <https://www.ttbz.org.cn/Home/Show/56617>。

③ 参见重庆发布和美乡村评价地方标准, http://www.ce.cn/cysec/stwm/gd/202307/07/t20230707_38621743.shtml。

④ 参见浙江美丽乡村规划的经验与启示, <https://finance.sina.com.cn/jjxw/2023-06-30/doc-imyyzcvx1405678.shtml>。

化^[6]。由此,和美乡村因立足大国小农基本国情、遵循“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成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具象诠释。

二是内部解读论,即解构其内涵意蕴,探讨各要素间逻辑关联,以“二分法”与“四分法”为代表。其一,“二分法”以表征形态为依据,将其分解为物质领域的“宜居宜业”及精神领域的“和美”两部分,提出“宜居宜业”是“和美”的前提,“和美”促进“宜居宜业”目标实现^[10],或将“宜居宜业”融入“和美”的表意,以“和”指代精神文明,以“美”指代物质文明,以“和美”囊括其全部含义,认为“和”是“美”的内在根本,“美”是“和”的外在显现,乡村因“和”而“美”、以“和”促“美”,从而成为“宜居宜业”之所。其二,“四分法”将其内涵投射至具体现实领域,以生活对应“宜居”、以产业对应“宜业”、以人文对应“和”、以环境对应“美”,认为产业美是基础、生活美是目的、人文美是灵魂、环境美是特征^[11],或将“宜业”作为物质基础、“宜居”作为生活条件、“和”作为精神理念、“美”作为三者作用的外化体现^[12]。简言之,“宜居”“宜业”“和”“美”之间建构起“基础—目的—理念—表象”逻辑链条。总体而言,两种视角构建起各要素间的对称性与互惠共生关系。

(二)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历史定位

和美乡村的历史定位是纵向变迁脉络和横向战略耦合作用的结果,既是“乡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美丽乡村”演进至新发展阶段的时代转译和现代表达,也是助推乡村振兴、农业强国和共同富裕的现实需要。

历史逻辑之维表征为和美乡村是对“乡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美丽乡村”的承继发展。其一,乡村建设派以农民改造与乡村文化重建为实践逻辑,但未能冲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桎梏,最终造成“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窘境。20世纪中后期的社会主义农村改造行动虽以土地制度变革助推农业生产提升,但呈现农村现代化屈从于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服务工业现代化的特征。和美乡村继承乡建运动“以文化人、以和建乡”的精神理念,延续农村改造行动以经济为基础、以效益为目标的实践准则,通过调和两者实现承继性创新。其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党领导乡村自治机制来强化其社会主义属性,又以“以工补农、以城带乡”为新理念,以农业生产、农民收入、农村人居环境统筹为新目标,其农业农村现代化一并推进的思想内嵌于“宜居宜业”的表述。和美乡村以“五治融合”激发农民助推治理有效的内生动力,在承继社会主义新农村“宜居宜业”逻辑理路上实现“和美”内涵的深化拓展。其三,美丽乡村在生态文明建设基础上对集体经济壮大、村财增收和农民致富提出新要求,指向外在美与发展美的辩证统一,施策重点落脚于物质文明建设。和美乡村在美丽乡村物质基础之上,与农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相衔接,追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2],体现乡村建设内涵丰盈与目标延展,是美丽乡村政策继承、实践延续和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7]。

现实逻辑之维体现为和美乡村是助推乡村振兴、农业强国和共同富裕的必然举措。其一,和美乡村与乡村振兴从外在与内里构建关联。外在层面上,和美乡村是乡村振兴重大任务,也是重要抓手^[13],与乡村五大振兴形成路径逻辑耦合;内里层面上,和美乡村是“和”文化融入乡村振兴的产物,也是乡村振兴对农民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的回应。其二,和美乡村夯实农业强国基础,其坚持农业农村现代化一体推进方略,有利于打造安居乐业的现代乡村,实现农民的美好生活愿景^[14]。其三,共同富裕既是和美乡村的“目标集”,也是“方法论”^[3],和美乡村以实现数亿农民的美好幸福生活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实现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14]。

(三)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立论基础

和美乡村立论基础总结为中国式现代化论、百年乡建承继论、城乡融合发展论、外部风险

应对论和“和”文化继承论。

1. 中国式现代化论

和美乡村作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具体表征,耦合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一是和美乡村立足于大国小农国情、顺应数亿农民所盼,是人口规模巨大的农业农村现代化;二是和美乡村坚守防止规模性返贫底线,锚定城乡一体化目标,修补农业农村发展短板^[11],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农业农村现代化;三是和美乡村以生产、生活、生态等物质文明为基础,同步推进乡风文明等精神文明,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四是和美乡村以绿色发展作为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内核,践行“两山”理论,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农业农村现代化;五是和美乡村先通过城乡工农产品“剪刀差”实现原始资源积累,而后实现以城补乡与城乡共融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模式,区别于西方通过殖民掠夺和黑奴贸易而实现资本积累的发展模式,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

2. 百年乡建承延论

中国式乡村建设走过百余年历程,各时期并非割裂,而是贯穿渐趋成熟的演进规律。具体言之:一是通过道德礼俗修复和农民素质提升唤醒农民主体自觉,以复兴文化为特征的乡村建设(1921—1948年);二是通过计划经济体制发展生产力解决农民温饱问题,以农业现代化为主导的乡村建设(1949—1977年);三是以城乡统筹为导向、以硬建设为重点的乡村建设(1978—2012年);四是强调生产、生活、生态、文化协调发展,软硬兼施助推综合价值实现的乡村建设(2013—2021年);五是以“和”为底色的高质量乡村建设(2022年至今),立足百年乡建奠定的物质基础,和美乡村在乡建传统中汲取精神力量,实现继承性创新。以“宜居”锚定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而指向生活和顺,以“宜业”定位产业兴旺、农民富裕、利益联结而实现生产和融,以“和美”强调文化繁荣与乡风涵育而助推文化和善、社会和谐。当前的乡村建设保留乡建文化自觉内核,追求社会主义改造的经济效益目标,落实农村改革的农民主体性激发理路,坚持新农村建设城乡统筹原则,贯彻美丽乡村绿色发展理念,延续乡村振兴“五位一体”布局,并进一步助推百年乡建的理论实践精髓承延,实现从自发式朴素建设向互动式多目标建设转型^[3]。

3. 城乡融合发展论

和美乡村承延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工农联合、城乡协同”思想精髓,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原则下重塑城乡关系^[15]。一方面,和美乡村指向城乡差距的多维缩小。宜居方面体现为城乡公共服务均衡及乡村生态功能强化;宜业方面表现为乡村经济支撑乡村人口生计;和美方面表征为治理和谐与文化和顺。同时,城乡融合实质是城市与乡村元素有机融合。因此,和美乡村根植于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通过经营性、盈利性和创新性理念应用激活传统要素,重建乡村价值^[2]。另一方面,和美乡村指向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建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两者是双向贯通关系;乡村为城市供给农产品、劳动力与旅游资源,同时成为产业梯次承接、细分领域业态分流的载体,从而缓解城市发展的人、财、地矛盾。

4. 外部风险应对论

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看,稳住农业基本盘、守好“三农”基础是应变局、开新局的“压舱石”。一是粮食安全方面,和美乡村将农业视作立国利民之本,通过科技创新与规模经营健全现代生产经营体系,助推农业提质增效,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二是社会安全方面,农业生产规模化与经营专门化使单位耕作面积所能承载的狭义农业就业人口下降,对此需通过和美乡村提升农村居住与就业条件,消弭城乡区隔,让农民进可扎根城市、退可回归乡村。三是经济安全方面,和美乡村促进城乡区域结构变革,以农村潜在市场发掘扩大内需、创造供给,强

化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为新发展格局构建夯实基础。由此,和美乡村建设成为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必然要求^[5]。

5.“和”文化继承论

“和”是一个内涵丰盈和意蕴悠长的哲学范畴,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内核。“和”具有六重释义,具体言之:一是“太和”,其植根于人生和创造力的本体宇宙论,是促使生命繁荣和万物和谐的力量。和美乡村以“山、水、林、田、湖、草、路、房”和谐统一的系统观念整治提升人居环境^[1],在尊重自然规律前提下促推人类对自然的正向回馈,体现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之和”。二是“义和”,指人性“善”,表征仁、礼、义、信“四德”。和美乡村贯彻“农民本位”理念,主张以德化人、以德治村,从孝老爱亲、耕读传家、明礼诚信等美德中汲取治理之智,贯彻“合乎礼仪”的“个人身心之和”。三是“中和”,指协调矛盾双方和谐共生、和融互促的中庸之道,是实现价值与善的方法论。和美乡村应用精准思维,以试点推广方式打造“点—线—面—体”建设格局,践行“和实生物”的“创新发展之和”。四是“人和”,意为生活和谐,是人性内在善外化于人际关系结果。和美乡村秉持去中心化思想,通过乡村共同体重塑继承“和而不同”的“群体人际之和”^[16]。五是“协和”,其是促使管理形成秩序、实现社会和谐过程。和美乡村承延治理有效目标,在“五治融合”之中塑造和谐社会,彰显“执两用中”的“处世待物之和”。六是“共和”,其具有天下太平之义。和美乡村锚定共同富裕目标,以县域为单位助推城乡融合,弥合城乡差距,落实“大同小康”的“社会平等之和”^[17]。

和美乡村存续上述五种立论基础,中国式现代化论处于统领地位,余下四类为具体表征。虽然它们代表不同视域,但均将和美乡村视为系统性工程,注重乡村内外各要素关联,并置于中国式现代化背景,彼此达成互补互促的逻辑耦合。

(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内生动力

学界形成“农民”与“村庄”层次二维内生动力研究,相关议题呈现时序承接性,贯穿于“乡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美丽乡村”“乡村振兴”研究中。

1.乡村建设的内生动力

在内涵意蕴层面,农民界面形成生产技术掌握、自组织力建构、思想道德修养的三维内涵,村庄界面体现为以农促工的自给组织、治理社会的自卫组织、联结精英农民的乡农学校等经济、政治、文化的三种形式。在现实困境层面,农民界面存续物质生活艰难、综合素养缺失、礼俗观念淡薄的三重困境,村庄界面存在中西文化碰撞、阶级与职业分立的两对矛盾。在推进策略层面,两者共同指向兴办职业教育、普及文化知识、恢复道德习俗的三项策略。该阶段研究对农民、村庄自身力量予以关注,但对其内涵理解停留在单向度文化素质层面,可视为研究启蒙探索阶段。

2.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生动力

在内涵意蕴层面,农民界面解读自觉担责的自主性、主动参与的自为性、权衡利益的选择性、自我突破的创造性^[18],村庄界面体现群体平等共处、利益共享、和谐共生的三个特征。在现实困境层面,农民界面存续心理被动、农民生计的制度缺失、农民利益的政策错位、农民能力的内在制约的四类问题^[19],村庄界面探究共同体意识弱化、互助文化式微、群体分化现象凸显的三类掣肘。在推进策略层面,农民界面提出主体组织建设、公共产品统筹、绩效指标调整、科学素养培训的四个举措,村庄界面明确政治民主型、生态保护型、文化繁荣型、成果共享型和产业现代型的五向方位^[18-19]。该阶段研究突破文化视角拘囿,注重农民、集体对村庄事务各领域的能动参与,同时应用城乡统筹和政民互动思维,跳出农村审视农村农民,成为研究突破演进阶段。

3. 美丽乡村的内生动力

在内涵意蕴层面,农民界面解读为主动共建的主体意识、有为共治的主体能力、长远共享的主体权益^[20],村庄界面总结为普遍性利益分配、共同性发展期盼、多维性内外互动建构。在现实困境层面,农民界面探讨农民意愿消减、农民作用遮蔽和农民利益虚化^[21],村庄界面分析社会关系碎片化、人际结构原子化与公共精神虚无化。在推进策略层面,两者指向前期政府主导、后期赋权农民与集体的时序逻辑^[20]。该阶段研究引入“共建共治共享”的共同体理念,体现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利益分配的“新内生式发展”特征,成为研究显著发展阶段。

4. 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在内涵意蕴层面,农民界面形成经济主动性、社会主体性、文化主体性的三域释义^[22],村庄界面总结为以党组织为引领,以新型集体经济为基础,集村庄政治、经济、社会功能于一体的村社组织的三个特征。在现实困境层面,农民界面存在党群关系悬浮、农民组织困难、价值取向偏差、个体自我除能等困境^[23],村庄界面探讨生产经营弱统强分、“能力本位”意识盛行、外生动力过度依附、基层治理机制缺位等问题。在推进策略层面,两者指向政策推动下外部资源注入、内部规则建立与社会资本重建的“外部激活+内部重塑”双向路径^[24-25]。该阶段研究细化界定其在多维领域的具象表征,以内外整合思维构建实践体系,现实指向明确,新内生式发展特征进一步彰显,成为研究完善成熟阶段。

5. 和美乡村的内生动力

和美乡村是新近提出的概念,学界延续“内生动力”议题进行探讨。在内涵意蕴层面,农民界面体现为最大受益者与共建共治责任者的两种角色^[12],内含延续农耕文明的“文化人”与适应现代乡村生活的“社区人”双重身份之义^[14],村庄界面表征为以决策共谋、发展共建、建设共管、效果共评、成果共享的运作机理与主体参与格局^[16]。在现实困境层面,农民界面体现为以自身思维代替农民意愿的主体性困境与农民知识文化欠缺的实质性困境^[26],村庄界面包含群众参与实践失范的程序性困境与利益联结机制缺位的结果性困境^[27]。在推进策略层面,农民界面遵循“认同—赋权—协作—共享”的参与式建设框架,形成农民赋责、赋权、赋能、赋力和赋利的“五赋一体”模式^[28],村庄界面从“内向观”视角凝结综合价值以重塑乡村共同体,从“外向观”视角运用乡土文化调和工业文明与消费主义以建构城乡共同体^[16]。该阶段研究承延先前研究的全领域覆盖、多主体参与特征,以现代化理论解读其内涵本质,以过程性观念探析其困境方位,以参与式思维、新内生发展理论、场域理论构建其实践系统,实现学理深度与务实效度双重跃升,成为研究创新升华阶段。

综上所述,学术理论派主要探讨和美乡村的指导理论与实践框架建构,通过全域视角界定其内涵,在纵横关系中把握其历史定位,以多维逻辑阐释其立论基础,聚焦农民村庄二维向度探讨其内生动力。总之,学术理论派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助推和美乡村理论深化,为研究深化注入持续动力。

三、基层实践派:新时代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如何落地实施?

和美乡村建设、运营和居住的主体是多元主体的集成,包括县乡村三级干部、企业、社会组织等,它们虽定位不同、功能各异,但各具优势,可通过扬长避短、协同互补,充分发挥自身效能^[4]。围绕这些主体定位职责展开讨论,形成基层实践派的话语体系。

(一) 县级干部:首要负责者与一线指挥者

县城是向上承接城市、向下服务乡村的关键节点,是吸纳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就近城镇化、

聚集乡村要素的重要载体^[8]。县域构成和美乡村基本单元,赋予县级干部以首要负责者与一线指挥者的角色定位,其应承担如下责任:一是以县域为单位,因地制宜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实现顶层设计本土性转译与创新性转化;二是以城乡统筹为原则,锚定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和城乡产业发展协同化,以更多资源整合使用自主权实现“五化”并联式发展;三是以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基础,依托县域资源禀赋,突出县城和中心镇的节点纽带作用,通过转型升级、结构优化、链条锻造和动能培育发展多元富民产业;四是以治理有效为重点,领导指挥与统筹协调县乡村三级治理体系建设,树立大抓基层工作导向,推动治理重心与资源下沉^[6]。

(二) 乡镇干部:具体规划者与主要管理者

乡镇干部身处政权结构最基层和服务群众第一线,是和美乡村的具体规划者与主要管理者,其应履行如下职责:一是科学制定发展规划,绘好“规划图”。立足村庄资源禀赋,吸纳乡贤、专家意见,彰显地域历史文化优势。二是全面推进乡村升级,制好“施工图”。既注重农村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建设,又优化养老、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同时以“五治融合”铸就和睦安定的善治乡村。三是追求长效发展模式,画好“背景图”。锚定可持续发展目标,坚持经济与生态效益齐头并进,以储运设施建设、监管制度运行为“硬约束”,以环保习惯培育、生态意识涵养为“软引导”,内外兼修推进和美乡村。四是双向强化人才振兴,描好“主角图”。构建“引一育一用一留”多点发力的人才保障体系,挖掘本土人才,吸纳外来人才,继而以倾斜扶持政策的集成为其搭建广阔的发展平台^①。

(三) 村干部:直接推进者与实际执行者

村干部是衔接政府与农民的纽带,既代表农民向政府传达和美乡村诉求,又在基层贯彻党和政府路线、方针与政策,是和美乡村的直接推进者与实际执行者。在工作推进中,村干部需不断学习增长才干,讲究方法提高效率,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具体言之:一是打好农民思想底子,承担宣传者与督促者角色,通过设置户外宣传栏、悬挂标语条幅、开展主题党课等线下方式及应用村民微信群、QQ群、村干部朋友圈、村庄抖音号等线上方式多渠道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统一农民思想,通过奖优罚劣、奖勤罚懒的长效机制培育团结向上的精神追求。二是找准村级发展路子,依托地理资源禀赋发展本土产业,挖掘自然人文优势,彰显产业特色,赋予乡贤情怀责任,充实人才储备。三是做出示范带动样子,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坚守党性、践行民本理念、强化责任意识、严格自我约束^②。

(四) 企业:资本配给者与智力支持者

企业作为营利性组织,具备资金、技术、市场、产业、知识等生产要素优势,能够在产业升级、利益联结、乡村建设等方面有所作为,把企业优势和农村区位优势、资源优势结合起来,助推农业农村现代化,因而成为和美乡村的资本配给者与智力支持者。具体言之:一是在产业升级层面,企业在粮食安全、农业科技、社会服务等领域持续精准发力,通过平台搭建集聚创新资源、先进技术引入促进提质增效、运储加销服务供给延长产业链条、本土资源整合推动三产融合。二是在利益联结层面,通过金融扶持、就业岗位供给、电商平台搭建等建立村企产业链利益共融机制,并通过“订单合同”“服务协作”模式建立村企利益联结机制,打造新型产业

① 参见绘好“四张图”建设和美乡村,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68581782412765749&wfr=spider&for=pc>。

② 参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三农”工作新的历史使命,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50290853032721242&wfr=spider&for=pc>。

联合体。三是在乡村建设层面,以资金投入支持农村道路、供水、互联网等硬件条件优化,提升基础设施完备度与人居环境舒适度,同时围绕一老一少、特殊群体,在医疗、养老、教育等领域发展慈善公益事业,增强公共服务可及度。总之,从物资捐助、产业投资、岗位供给等直接措施,到教育帮扶、健康帮扶、互联网帮扶等服务保障,再到村企共建利益联结的长效机制,企业依循市场和社会逻辑,凝聚社会资本,提升乡村经济发展组织化水平,为和美乡村奠定基础^①。

(五) 社会组织:服务提供者与资源协调者

社会组织是沟通政府、社会、企业与农民的桥梁,能以公共决策参与、社会资本培育、文明风尚倡导、志愿活动组织等多元方式助力乡村振兴,成为和美乡村的服务提供者与资源协调者。具体言之:一是在产业振兴层面,社会组织可参与产业发展的引导探讨,需了解产业生产经营规律、国家经济改革方针和国内外经济发展趋势,同时还需掌握经济管理领域专业知识;二是在人才振兴层面,需动用人社、教育资源,组建专家顾问团队,配合政府、协调企业,通过技能培训开展、政策倾斜落实培育本土人才;三是在文化振兴层面,输送先进文化,以丰富文化知识培养文化新人、改变人的落后观念为导向组织开展培训讲演、文艺演出等文化活动,同时发掘本土文化,以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特色文化诠释乡愁,讲好乡村故事,让乡村优秀文化与当代社会文明融于一体;四是在生态振兴层面,需宣传“两山”理念,增强农民现代生产生活意识,健全生态补偿市场化机制,涵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生态;五是在组织振兴层面,应致力于公益性、服务性、互助性事业,将志愿服务活动作为基层治理的有益补充,减轻村级组织负担、赋能集体组织发展,增强乡村治理效率与信度^②。

和美乡村虽是新近提出的概念,但其建设理念贯穿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振兴”等时间跨度大、空间范围广、专业领域多的实践之中。基层实践派并非“另起炉灶”,而是在承接既有经验基础上不断创新和深度实践,推动和美乡村高质量建设。

四、结论与讨论

和美乡村研究现存政策、理论与实践三种取向。主流政策派聚焦和美乡村的顶层设计,围绕历史必然性、提出必要性、实施机制、规避误区展开论述,从而明确研究方向和引领学术思潮。学术理论派从整体与内部视角界定其内涵意蕴,在历史与现实逻辑中明晰其历史定位,围绕立论基础形成五类观点,聚焦农民、村庄二维向度探讨其内生动力,从而深化和美乡村理论研究。基层实践派聚焦和美乡村的实施保障,以县乡村三级干部、企业和社会组织为实践主体,根据其各自定位承担不同职责。然而,作为和美乡村主体的农民却被排除在话语体系外,并与理论阐发、现实关涉、国际对话缺位等构成其理论深化与实践效能提升的制约因素。因此,未来和美乡村研究应从五个层面深化。

第一,以农民视角优化研究理路。在实证研究层面,应综合运用定性与定量方法,倾听农民对和美乡村建设诉求,作为理论模式建构与政策制定依据,将农民意志转译为学术与政策话语。在理论研究层面,带入多元学术理论,创新研究视角:一是引入参与式发展理论,以“前提—主体—程序—结果”逻辑构建农民参与和美乡村分析框架,探析以认同意识作为前提

^① 参见政企民如何与乡村共生长?“谢径安”先行“探路”,<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69044644340307346&wfr=spider&for=pc>。

^② 参见社会组织如何发挥文化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71655319017235168&wfr=spider&for=pc>。

保障,以内生能力、外部扶持作为主体保障,以参与渠道作为程序保障,以成果共享作为结果保障的运作机理;二是遵循新内源发展理论,探讨以地方政府的政策推力及社会力量的要素扶持为表征的外源动力,与以承担村民诉求表达、决策参与功能的自治组织及承担资源分配、利益对话功能的集体经济组织为载体的内生动力的互构机理;三是借用“牵引式治理”的解释范式,贯彻“利益牵引”理念,构建“在互动中衔接—在衔接中参与—在参与中共赢—在共赢中培育”的论述体系。

第二,以理论视角融入哲学思辨。在历史之维,以和美乡村为坐标,追溯以近代乡村建设运动乃至古代农村社会变迁为起点的乡建演进历程,跳出“就和美、论和美乡村”的迷思。在文化之维,探源“和”文化的演进理路,凝练主流儒家文化中“和谐共生”的价值取向、“和而不同”的行为机制、“和实生物”的辩证思维、“天人合一”的理性诉求等思想义涵,聚焦以农业生产、农民生活为思想内核的农家学派,剖析“市贾不贰、国中无伪”的“交换公平之和”、“天地协和、阴阳调和”的“自然平衡之和”、“食为民本、农为国基”的“民生顺平之和”思想的时代价值及其对和美乡村的镜鉴。

第三,以现实视角精准定位痛点。基于反思性逻辑,审视和美乡村的实际问题,例如大拆大建中农耕文明延续的断裂、“千村一面”中乡村独特价值的遮蔽、“面子工程”中政绩价值导向的偏离、资本下乡中农民发展权利的裹挟、“西学东渐”中农村精神文明的滑坡、科层体制中干部事务缠身的困境。具体言之,可从考评环节入手,推进兼顾物质与精神、统筹当前与长远的指标体系建构;此外,也可以基层干部内生动力激发为突破口,研究构建“权责界定—资源整合—制度保障”的权力下放路径,构建适度放权、高效用权、长期督权的格局。

第四,以对外视角构建学术对话格局。一方面,立足基本国情,借鉴他国经验,比如:借鉴“农业农村综合价值实现”的日本模式,剖析其人居条件优化与农民就业、农业兼业化同步推进的农业农村现代化路径及其借鉴价值;对照“工农城乡统筹均衡”的韩国模式,解构以区域均衡政策、社会均衡政策、产业布局政策为核心的顶层设计架构及其启发;参考“整体性可持续发展”的欧盟模式,阐发德国归并乡村更新、田地重划和农业结构调整的规划框架及其经验启示。另一方面,彰显和美乡村的中国智慧,为后发性国家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中国方案。国际农政研究存在马克思主义、实体主义、新古典/新制度经济学、后现代/后结构主义和生计框架五大理论,可成为研究所援引的学术资源。因此,应该对标中国式现代化和党的二十大精神要求,从五大国际农政经典理论出发提炼中国式和美乡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原创性贡献和对其他农政理论经典元素的运用,构建“一核多元”(马克思主义为核心、其他理论元素融入)的中国式和美乡村建设理论。具体言之,和美乡村以马克思主义为总体指引,以实体主义为价值遵循,以新古典/新制度经济学为效率保障,以后现代/后结构主义为省思方向,以生计框架为底线思维,通过国际学术话语体系的交流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彰显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第五,以整体视角助推“实践—理论—政策”大循环。在政策之维层面,聚焦政策进入基层的逻辑理路,构建“政策传达—本土转译—基层执行—农民反馈”的研究框架,从实践行动中找寻问题、从基层声音中定位需求,助推和美乡村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的上下结合。在理论之维层面,应当强化实证取向,通过田野调查进入和美乡村的实际情境,在和美乡村建设参与中增强经验质感,挖掘乡村建设的客观规律,增强理论研究的前瞻性和实践性,发挥研究引领政策、指导实践的积极效能。在实践之维层面,应以自下而上思维聚焦基层实践对政策文本的适应性调整与本土性转译,同时坚持和美乡村的实践本位,保持对和美乡村地方多元实践的包容心态,从浙江“千万工程”和湖北“共同缔造”等差异较大的和美乡村地方实践中进

行经验提炼与理论提纯,形成和美乡村实践、理论和政策的“大循环”。

参考文献:

- [1] 金文成.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J]. 农业发展与金融, 2023(1): 11-14.
- [2] 孟德才, 刘知宜. 和美是中国式的乡村价值追求[N]. 农民日报, 2022-11-17(08).
- [3] 刘建生, 郝柯锦. 共同富裕目标下和美乡村建设机制与路径研究[J].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 54(4): 91-99.
- [4] 黄祖辉.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在“和”字上做文章[J]. 农村工作通讯, 2023(5): 40-42.
- [5] 彭超, 温啸宇. 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J]. 中国发展观察, 2022(12): 32-38.
- [6] 胡春华.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N]. 人民日报, 2022-11-15(06).
- [7] 张永江, 周鸿, 刘韵秋, 等.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科学内涵与建设策略[J]. 环境保护, 2022, 50(24): 32-36.
- [8] 杨春华. 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J]. 红旗文稿, 2023(3): 26-29.
- [9] 张红宇, 周二翠.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现实基础与实现路径[J]. 中国农村经济, 2023(9): 36-47.
- [10] 吕捷, 赵丽茹. 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J]. 学习与探索, 2023(8): 132-140.
- [11] 唐珂.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文化探源[J]. 农村工作通讯, 2022(24): 32-34.
- [12] 蒋茜.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理论逻辑与现实路径[J]. 行政管理改革, 2023(8): 24-33.
- [13] 张宇伯, 王丹. 乡村振兴视野下和美乡村建设评价模型研究[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0(3): 168-176.
- [14] 吕方.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J]. 新视野, 2023(3): 84-92.
- [15] 蒋辉, 丁美华. 和美乡村建设的三重逻辑、战略路径与施策重点[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社版), 2023, 43(12): 144-152.
- [16] 张熙, 杨冬江. 从“乡村美化”到“和美乡村”——新时代“美丽乡村”的内涵变化、建设路径及价值探析[J]. 艺术设计研究, 2023(3): 69-74.
- [17] 成中英, 赵长江. 儒家和谐论的六个层次[J]. 河北学刊, 2006, 26(6): 26-30.
- [18] 孙绪民, 桑爱友. 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性之考量[J]. 调研世界, 2007(7): 3-6.
- [19] 胡天明, 周跃龙. 农民主体性“嵌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7(1): 23-26.
- [20] 刘利利, 杨英姿. 美丽乡村建设中的主体角色定位探究[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6): 29-37.
- [21] 李永安. 美丽乡村建设须破解“梁漱溟之惑”[J]. 宁夏社会科学, 2017(2): 41-48.
- [22] 王春光. 关于乡村振兴中农民主体性问题的思考[J]. 社会发展研究, 2018, 5(1): 31-40.
- [23] 王进文. 带回农民“主体性”:新时代乡村振兴发展的路径转向[J]. 现代经济探讨, 2021(7): 123-132.
- [24] 苏毅清, 邱亚彪, 方平. “外部激活+内部重塑”下的公共事物供给:关于激活乡村内生动力的机制解释[J]. 中国农村观察, 2023(2): 72-89.
- [25] 贺雪峰. 如何再造村社集体[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19(3): 1-8.
- [26] 邓源. 和美乡村的美学内涵与价值传递[J]. 农业经济, 2023(6): 75-77.
- [27] 葛丹东, 童磊, 吴宁, 等. 营建“和美乡村”——传统性与现代性并重视角下江南地域乡村规划建设策略研究[J]. 城市规划, 2014, 38(10): 59-66.
- [28] 于水, 陈永强. 从共识到行动:和美乡村参与式建设的经验透视与实现路径[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23(5): 111-117.

(责任编辑:李凌)

A Village with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Social Harmony: Who are Talking about It, and about What?

DOU Shulong ZHU Qinghe DING Dazeng

Abstract: Currently, there are three main research approaches centered on the concept of a village that offers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social harmony. Policy analysts primarily focus on the top-level design of such villages, underscoring the historical context, the inevitability and necessity of these developments, the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s, and the prevention of misunderstandings. Academic theorists, on the other hand, are deeply engaged with the theoretical essence and underpinnings of these villages. They analyze the concept from both holistic and internal perspectives, deconstructing its multifaceted nature.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e legacy of a century of rural construction, the principles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strategies for responding to external risks, and the concept of “harmonious” cultural heritage provide the scholarly framework for their inquiries. These theories aim to unravel the complex dynamics of farmers and villages, seeking to understand their intrinsic motivations and capabilities. Practitioners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are preoccupied with the guarantees for realizing a village that is both employment-rich and socially harmonious. County and rural cadres, enterprise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play key roles in this endeavor, each contributing according to their specific roles to achieve collective strengths. However, farmers—as the primary agents of change in these villages—are notably absent from the discourse, leading to a disconnection betwee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This gap impairs the depth and effectiveness of research, as it lacks theoretical substantiation, practical applicability, and international exchange. To address this issue, future research should encompass five interconnected perspectives: those of the farmer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s, the practical context,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the holistic considerations. By doing so, we can enhance the research to be more effective, rational, targeted, inclusive, and systematic, thereby fostering a dynamic “policy-theory-practice” cycle that is both sustainable and impactful.

Keywords: Village with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Social Harmony; Mainstream Policy-interpreters; Academic Theorists; Grass-root Practitioners